

博物、博物学与中国古代绘画

杨乃乔

严格地讲,中国学界把老普林尼的 *Naturalis Historia* 翻译为《自然史》,这个翻译在观念上不恰当,应该把其翻译为《博物学》或《博物志》,更为准确。在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西方的哲人及“naturalist”,还是中国的士人及“博物君子”,他们在探究现象界、本体界与人文社会的方法论上只能是知识的宏大性观察,而不是实验。

中国古代画史是近年来施筠博士执着拓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而《宋元画史中的博物学文化》这部专著即是她在这一研究方向下沉淀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这里,我想就这部专著及她持有的研究方法论简约且集中地谈几点,以飨学界同仁。

值得提及的是,在从事具体研究时,无论我们怎样给中国古代画史下定义,中国古代画史的内涵还是由形成于系谱的历代画家及其作品所构成的。实质上多年来,中国美术史论界以往对中国古代画史的研究,其主要还是定位于绘画本体及其审美表现形式与技法风格的研究上。是书作者则规避了以往研究的窠臼,调整了研究观念,她把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作为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透镜,从而把中国古代画史研究还原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的宏大背景中,以追问宋元两朝绘画与文史之间所交融的现象和本质之关系。

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中国古代绘画已不再是一种纯然的外在审美表现形式。作者把画面形式本体所呈现的物象与人等诸种元素紧密地维系于中国古代文史传统中,通过透视中国古代官制、宗法、政治、宗教、民俗、器物与服饰等文史成因,从而把中国古代画史研究向博物学领域拓宽与拓深。从学理上讲,她是借助于中国古代画史研究,在博

物学研究观念的策动下,有效地发现、思考与解决文史研究的问题。在她的视域中,画面所表现的物象与人等元素,必然是对一个特定时期之文化与历史的审美记忆,这些元素反过来也成为对文史领域的有效注解,而不仅仅是一个个表现画家个人意境的审美元素。这就是从一件古画看文化、看历史,而不再是囿限于狭小的视域。

当然,这部专著把中国古代画史研究置放于文史研究、博物学的宏大背景下,这或许也将有效推动中国古代画史研究成为了一门更厚重的学问,推动研究者面对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给出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及更为准确的诠释。中国古代水墨丹青的背后正是博物学意义上的文史。

就我对作者的了解,她的研究兴趣不仅定位于中国古代美术史,多年来,她也沉浸于西方美术史及其文史的脉络中,“西学”是她的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该肯定地讲,她是一位有能力对中西美术史进行比较研究的青年学者。可以肯定地说,作者在把博物学及其研究观念恰切地带入中国古代画史研究,以透视宋元画史背后的博物学文化时,这本身就是把中西学术观念汇通于一体,以形成交集于中西美术史之间的跨语言、跨民族与跨文化的研究立场。

在这里,我有必要就“博物学”这个概念的语源系谱给出一个简约的追溯,以便让《宋元画史中的博物学文化》这部专著的读者了解作者的研究立场是怎样定位的。从学理的逻辑上来看,只要理解了博物学这个概念的历史成因,也就能够获知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所在。

博物学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学术概念,其英文源语概念为“natural history”。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倘若把“natural history”按照现代英语之字面意义翻译为“自然历史”,这一定是因为不了解这个学术概念的发展逻辑而给出的误解。在这个学术概念的意义组合逻辑上,其中心词“history”的原初意义不能被转码为汉语译入语——“历史”。我们把“natural history”翻译为“博物学”,它作为一个汉语译入语概念,一般读者是很难从汉语字面上直接提取其源语概念的本质性意义的。那么,在印欧语系中,“history”的原初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语源学的逻辑上,我们可以把“history”再往上一个层级追溯至拉丁语“historia”,总纳相关《拉丁语词源词典》对“historia”的释义,我们至少可以获取两种如下的释义词条:“a narrative of past events, history.”或“learning through research, narration of what is learned.”从对“historia”的释义,我们可以见出这个拉丁语

术语含有现代英语“history”的意义,同时,也含有“探究”(“learning through research”)的意义。

让我们再往上一个层级的语源追问,拉丁语“historia”的语源是古希腊语,我们总纳相关《希腊语词源词典》的释义,至少可以获取如下三种相关的释义词条:“inquiry”“to learn through research, to inquire.”或“written account of one’s inquiries, narrative, history, prob.”从释义词条的排序上,我们可以判断,“history”的原初语源意义即为“inquiry”,其转码为汉语译入语就是“探究”,而其中“narrative, history”则是后起的意义。因此,无论是拉丁语“naturalis historia”,还是英语“natural history”,它都应该被翻译为是一门对自然探究的“博物学”,或翻译为“博物志”。这两种翻译的汉语修辞在学术意义的表达上是最为恰切的。

在西方古代文史传统的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把博物学的源起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群体那里,其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是早期的博物学者(naturalist),当然还有与他同期及后来的哲学家们,他们都是博物学者。古希腊的哲学家出于对其所生存的世界之好奇,以探究自然界存在的多样性问题,他们博物多闻,所探究的现象涉及了自然客体(natural objects)、生物体(organisms)、

地理学(geology)、天文学(astronomy)、工艺技术(technology)、艺术(art)与人文(humanity)等领域。因此把“nature”这个词转码为“博物”,在汉语译入的修辞上是极为恰切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naturalist”翻译为“博物学者”,而不是转码为“自然科学者”。

从古希腊哲学发生的基本动因来解释,他们的探究是思考于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其终极目的是为人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当然,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判断,他们的探究也是为了兑现以思想解释宇宙,从而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且满足哲人的征服欲。无论怎样,在古希腊时期,由于知识的发展还没有体系化为精细的现代学科分类,他们的探究与思考在综合性与多样性中呈现出极为广博的知识修养。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无论“natural history”这个学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历史语境所产生怎样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均可以把这个概念依凭其丰富的知识内涵翻译为博物学或博物志。其实,中国学界把“natural history”翻译为“博物学”或“博物志”,在汉语译入修辞拣选的立场上,也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史传统在生成与发展的观念中,含有对应于西方古

(下转9版) →

← (上接7版)

那里下来的纪检官员督邮忽然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宋书·隐逸传·陶潜传》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公田之利”固然重要,个人自由价值更高,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回故乡

隐居。

陶渊明又画了一个始而仕搞创收,终于退场要自由的圆圈。

五

陶渊明归隐以后,也曾有人劝他东山再起,他不同意,说是“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

就。”(《宋书·隐逸传》)言行一致,态度坚决。

此时陶渊明日子过得潇洒,不愁生计,一度还有“我土日以广”(《归园田居》其二)的大好形势,稍后发生一次火灾,损失甚巨;到他晚年,经济状况更差,所以当刘宋王朝有意请他出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只不过很快到来的死亡把一切都结束了。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

三。”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此事虽未能实现,但后来仍然有专家称陶渊明为“宋征士”(钟嵘《诗品·中》)。陶渊明之所以“将复征命”,无非是因为想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晚年的陶老身体很差(“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多日躺在病床上(“偃卧瘠馁”),正是在这样实在难以继的困窘处境中,他表示可以考虑复出,可惜这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生活,创收是必须的,

但自由高于创收,而生命又高于自由。最好是既有较多收入而又相当自由,可惜这两者不容易兼顾。陶渊明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端中摆来摆去,多次往返于体制内外,先后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而始终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中,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